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3 2004
(第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

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

祝天智

(南京大学 政治与行政关系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晚清,儒学的政治社会化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核心内容即儒学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因无法应对现实的挑战而失去合理性,其主要实施机制即儒学教育逐步被新式教育所取代,其动力机制即科举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而最终被废除,其强抑制机制即严禁"异端邪说"因西学的涌入而失效。

关键词: 儒学;政治社会化;政权衰败

中图分类号: D0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3-0081-05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1]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学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儒学的社会化并建立了完备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儒学的政治社会化以儒学的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以各级官学和私塾里的儒学教育为实施机制,以科举制为动力机制,以严禁和残酷镇压各种"异端邪说"为强化机制,构成了严密的体系。儒学的有效政治社会化为封建政治统治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基础、有力的社会整合工具和源源不断的统治精英,保证中国封建政治统治能经受无数次打击而绵延不绝,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鸦片战争以降,儒学的政治社会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是中国封建政治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封建政治进一步衰败的重要原因。

一、儒学政治社会化核心内容的"真理性"大量流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虽然遭到过多次冲击和挑战,但它以其强大的包容机制不断吸收新的内容并不断修正自身而始终保持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言,儒学主要内容为:①天道观念、②大一统观念、③纲常教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2],这些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从多角度为封建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天道观念宣扬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从神学角度为君主专制提供论证;大一统观念宣称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政治角度为君主专制张本;儒学纲常伦理强调"忠"、"孝",注重三从四德,从伦理角度为君主专制辩护。三者有机结合,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精神和理论支撑,这是中国封建专制大厦屡经风雨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既无法解决频生的国内统治危机,更无力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儒学已不能提供应对时局的有效办法,儒学政治价值观和伦理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经历了从逐渐被怀疑到最终被抛弃的历史命运。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天道观被摒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形势是"变亦变,不变亦变",巨变伴随着西方列强血腥的侵略,深刻

收稿日期:2004-04-07

作者简介:祝天智,男,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而迅猛,使中国人饱尝了变的伤痛。为了应对时局,晚清的士大夫们被迫逐步抛弃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天道观念,先是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呼吁,再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指出变是宇宙和人类的常例,天因常变才能久,地因常变才能恒。在当时的情境下,清政府“能变则强,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心理磨难,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只有变革才能求生存的道理。到清末,求变成为人们最强烈的心理诉求,变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就连顽固如慈禧者也不能不挂起变法的招牌。

其次,大一统观念不复存在。大一统不仅指海内一统,而且指天下一统。在鸦片战争之后,无论是海内一统的观念,还是天下一统的思想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一方面,自太平天国起义始,汉族地方地主开始崛起,满族一统天下和中央高度集权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洋务企业的壮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维新派和革命派不断壮大并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享有政治权利。这在观念上带来的结果是:反满情绪日高,民主和自治呼声渐涨,海内一统的观念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天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立刻威风扫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屡战屡败的事实证实了“蛮夷”的强大和满清的虚弱,清朝皇帝被赶得狼狈逃窜,上国之都城任“夷人”践踏。清政府先是被迫同意历来被认为是类同禽兽的“夷人”进住北京,后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用以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再是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最后是设立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和鄙视外国人的虚骄心理被彻底粉碎,天下一统也成了昨日黄花。

再次,儒学纲常教义遭到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伦理化,即国与家同构,政治与伦理一体。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戊戌辛亥时期,儒学纲常遭到猛烈的抨击并被彻底否定。梁启超把“君为臣纲”斥为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称历代统治者是“民贼”,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3]。谭嗣同则称纲常教义为“罗网”,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4],“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皇帝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国民”;礼教并不是人类“固有之物”,而是所谓的“圣人”制定出来,历代的“独夫民贼”用来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们控诉“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致死亡不止”。儒学纲常伦理成了改革的目标和革命的对象。

二、儒学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实施机制被取代

“官府学校和私学以及各种蒙学是儒家思想教育和传播的最主要渠道。”[5]自从汉武帝诏令设置太学,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以来,各级官学和私塾就一直是中国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清朝的帝王更加需要利用儒学来加固他们的统治。儒学教育在清朝受到了格外的重视。1825年,“全国有包括府、州、厅、县、旗、卫各类官学1788所,清代书院在数量上更远迈前代。”[6]但鸦片战争以后旧式学校和传统教育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并最终被取代。首先,从洋务运动开始清朝统治者被迫进行了一些革除旧学校、举办新学堂的教育改革。“从1862年举办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893年,洋务派共举办包括语言学堂、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的各类新式学堂二十六七所。”[6]这些学校虽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在学习西方语言、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也翻译了一些西方政治和社会书籍,使人们开始接触和了解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这无疑会对儒学教育造成冲击。到戊戌维新时期,教育改革更加迫切,中国教育新陈代谢的速率大大加快。维新派指出:“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7]并且高呼“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8]。虽然慈禧很快扼杀了变法,但她却无法阻止教育改革的步伐。一方面,变法在教育方面进行了重

大改革,规定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另一方面戊戌变法使风气大开,新式学堂代替旧式学校成为大势所趋。戊戌后不过三年,慈禧不得不重启光绪皇帝没有完成的教育改革事业。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反复强调‘时世多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并设立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严令各级政府把兴办学堂作为‘当务之急’,允许并鼓励私人兴办学堂。到 1909 年,‘学堂数达到 59177 所,学生数达到 1639921 人,从 1904 年到 1912 年,学堂和学生数分别增长 20 倍和 31 倍。’[6] 在这些学堂里‘忠君、尊孔’的宗旨虽然仍被保留,但增加了‘尚公、尚武、尚实’的规定,而且与旧式学校不同的是这些新式学堂增加了各种实用知识的教授,这使儒学脱离实际、空疏无用的政治说教逐步失去了市场。

其次,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对儒学教育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传教士逐步深入内地并在中国‘设立了广泛的学校网’。仅‘耶稣会士管理的江南(江苏和安徽)教皇代牧区,据报道 1878 - 1879 年有 435 所男学校和 6222 名男学生,213 所女学校和 2791 名女学生;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江南天主教学生的总数已逾一万六千名。’[9] 与旧学校不同,在这些学校里偶像是耶稣而不是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圣经》而不是儒学。而且有些教会学校的学生依仗西方列强的特权,滋事生非,挑起诉讼,挑战地方绅士的权威。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增多既直接又间接地阻碍了儒学的传播。

再次,派出留学也对儒学教育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一方面,清政府为了‘师夷长技’,不断地派人出国留学;另一方面,由于仕途越来越狭窄,不少人自费出国,留学浪潮不断高涨成为晚清的一大景观。从 19 世纪 70 年代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开始,留学人数不断上涨,到 1906 年仅留学日本的学生就达 8000 人以上。清政府派出留学的目的本来在于让他们学习西方的技术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然而事与愿违,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学说更感兴趣,这些人不但自己信奉,而且在国内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学说不但比儒学有更多科学性和更严密的逻辑,而且以崭新的面目出现,适应晚清中国人强烈求新求变的心境,因此很快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西方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使儒学教育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

三、儒学政治社会化动力机制被最终废除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10]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政治的重要支柱,也是封建统治者推行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杠杆。对统治者而言,一方面可以利用科举制给每一个读书人荣登天子堂的梦想,引导他们为步入仕途而皓首穷经,同时尽量把知识精英都录用到政治系统中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科举制推行有利于其统治的政治文化,把所有的读书人都塑造成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信徒,防止他们产生异端思想。就普通民众而言,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实现上升性流动的最有效的渠道,而读书又是科举入仕的唯一法门,为了准备考试,许多人花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苦读统治者为其指定的经书。这样,儒学政治文化在科举制动力的驱动之下成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自明清以来,统治者更是有意识地利用科举制来推行儒学的社会化,严格规定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以及官方的注释为标准,严厉钳制人们的思想。

然而,自清朝中后期以来科举制开始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危机。首先,由于人口的增殖和读书人的增多,作为政治社会化主要动力机制的科举路径越来越拥挤。这产生两个直接后果:一方面,许多人通过‘捐纳’的办法取得功名,甚至出现到‘1860 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11] 的现象;另一方面,不少人放弃入仕而转入商业等其他行业,‘当时(晚清)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动是这样一件事:他们常常让自己的子弟学商,而不是强迫其入仕

以求光大门楣。”[11]甚至“到十九世纪终结时,这种新集团的形成已经比传统方式起家的绅士名流的发展更为重要了。”[11]新的上升性流动方式和渠道的兴起意味着科举制衰落的开始。

其次,鸦片战争以后,作为政治社会化主要动力机制的科举制成为众矢之的而被最终废除。科举制培养出来的清朝官员在鸦片战争及以后与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暴露出他们的颟顸无能,科举制也越来越成为抨击的焦点。梁启超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8]张之洞和袁世凯在联名奏请递减科举的奏折中得出结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而且“科举夙为外人诟病。”[12]到1905年,科举制终于在各种压力下被宣布寿终正寝。科举制的废除意味着儒学的政治社会化同样到了穷途末路:儒学不再是获取功名和跻身社会上层的有效工具,而开始变成了迂腐和无用的象征;大多数青年转而追求更新颖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更实用的近代科学技术,甚至很多已经取得一定功名的读书人也不得不转到新式学堂。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最终丧失,儒学的政治社会化也最终终结。

四、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强抑制机制逐步失效

为了维护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历代统治者都对离经叛道、侵犯皇权的“异端邪说”实行严厉禁止和血腥镇压的政策,并通过编书修史、删改儒家经典、大兴文字狱惩治思想犯罪和倡扬告密等办法建立了一套严密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强抑制机制。这种强抑制机制和学而优则仕的选官机制相辅相成、一硬一软共同保证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得以绵延不绝[13]。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清朝前中期,统治者更是一方面通过编修《四库全书》大肆删毁“禁书”、“邪书”,另一方面频繁制造血腥的文字狱以钳制士人之口,迫使士人远离政治,躲入故纸堆,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鸦片战争之后,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强抑制机制开始失效。清政府虽有办法钳制士人之口,却没有办法掩盖清朝与西方相比的虚弱和落后。鸦片战争和以后的历次反侵略战争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同时也证明了汉学的烦琐和理学的空疏。一方面,残酷的现实和巨大的挑战迫使知识分子放眼世界、思考时政。先是以魏源为代表的改革派倡言经世致用,指陈时弊,要求改革,并提出要“师夷长技”;后是以冯桂芬、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指出中国“四不如夷”,并向国人引介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学说;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打着孔子的旗号要求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最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拿来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武器。另一方面,尽管还有人在高谈“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的胡言乱语,但面对屡战屡败的现实和西方列强步步紧逼的压力,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武器装备方面不如夷,而且有意识地推行了一些诸如设立同文馆翻译西书、派出留学、引进西方机器设备等学习西方的政策。虽然清政府学习西方的目的是要消弭内乱、抵御外患以“永固皇基”,但一旦国门打开,与世隔绝的环境不复存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渗透进来,尤其是随着清朝统治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和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慈禧虽然暂时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却无法取消资产阶级实行君主立宪的要求而被迫宣布“预备立宪”,而资产阶级革命学说更是清政府所无力镇压而最终反被其所埋葬,儒学社会化的强抑制机制随封建统治的灭亡而终结。

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意味着清政府合法性不断丧失和政治整合、政治控制能力不断弱化,表明晚清政权正在走向衰败化。同时,由于居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儒学失去了整合作用,加上作为政治录用机制的科举制无法培养和选拔忠于封建统治的人才,特别是由于清政府已无力禁止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传播,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危机又在某种意义上加快了晚清的政权衰败化过

程。而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和政权衰败化又共同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元书 . 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J] 北京:政治学研究, 1998, (2) .
[2] 王亚南 .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3]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 . 中国近代史[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4] 谭嗣同 . 仁学[A] . 谭嗣同全集[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5] 金太军 . 论中国封建社会儒学传播和延续的教育机制[J] 郑州:中州学刊, 1997, (1) .
[6] 田正平 . 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7] 汤志钧编 .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8] 梁启超 .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1 册[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9] 费正清, 刘广京编 .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0] 罗志田 .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J]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1998, (4) .
[11] 费正清, 刘广京编 .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2] 朱寿朋编 . 光绪朝东华录[M] . 北京:中华书局, 1958 .
[13] 金太军 .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机制[J] . 北京:政治学研究, 1999, (2) .

Crisis of Confucianism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Later Qing Dynasty Teaching of Confucianism Political Value

ZHU Tian-zh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fell into unprecedented crisis in later Qing Dynasty . The central content, political value and moral standard of Confucianism, lost its ration because of challenge from reality . The main enforcing mechanism, education of Confucianism, was replaced by new education . The propelling mechanism, the examination system, was rescinded because of more and more criticism . The suppressing mechanism, prohibiting heresy system, lost potency because of more and more academic from the West poured into China .

Key Words: Confucianism Political Socialization